

# 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

## ——基于闽西北集体林区农户调查

林丽梅, 刘振滨, 许佳贤, 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选用福建省三明市、南平市的 13 个乡镇 179 份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 从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林地自然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选取变量, 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统计显示: 54.2% 的农户愿意转入林地, 实际转入林地者占 30.2%; 20.1% 的农户愿意转出林地, 但实际转出林地者占 4.5%。计量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资本仅对转入行为、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他维度各有 1 个变量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 平均受教育年限、林地总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林业技术获取难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外出务工成员数和上学人口数均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劳动力数量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林地总地块对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对转入行为和转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关键词:** 家庭禀赋; 林权流转; 行为; 意愿

中图分类号: F326.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6)02-0016-06

## **Influence of family endowment on farmers'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forest land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ouseholds in collective forest area of northwest Fujian province**

LIN Limei, LIU Zhenbin, XU Jiexian, ZHENG Yifa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s:** Based on 179 rural household samples from 13 townships in Sanming, Nanping of Fujian province, selecting the variabl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family human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endowment on th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household'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54.2% of the households are willing to transfer their land into forestland, and the rate of actual forest land transfer accounted for 30.2%; 20.1% of peasants are willing to transfer their forestland out, but the percent of peasants who actually turned out the forestland is 4.5%.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e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ransfer behavior and intention, and each of the other dimensions has only one variable that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behavior and intention. Moreover, it indicates the average education period and the woodlands' area have positive impact, while the availability of forestry technology has a negative impact, and migrant population and education population burde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In addition, it also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labor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ransfer into behavior; the number of woodl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flow willingness, and the variable whether the family has village cadres or staff in forestry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ransfer into behavior and transfer out intention.

**Keywords:** family endowment; forestry circulation; behavior; intention

### 一、问题的提出

2003 年以来, 中国相继在福建、江西、浙江、辽宁等地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措施促

收稿日期: 2015 - 12 - 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3020); 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2014C025)

作者简介: 林丽梅(1987—), 女, 福建仙游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管理。\*为通信作者。

使家庭经营成为集体林区的主要经营形式,激发了农户进行林业生产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实现了土地的保护性使用,但改革后的林地细碎化和经营能力差异问题难免引致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制约林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因此,鼓励农户通过合作经营、市场交易促进林地流转,成为“分林到户、分山到户”制度改革之后的必然选择,甚至是解决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集体林区林地细碎化和林业产业经营规模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关键。

国内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聂影从农户及其家庭特征、林业产业经营特征与林权制度改革等三个层面对林农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sup>[1]</sup>;蔡志坚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农户特征、农户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环境、林地流转政策等方面构建了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sup>[2]</sup>。徐秀英等利用浙江省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调研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家庭收入及其社会资本对其流转行为具有显著影响<sup>[3]</sup>;孔凡斌基于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从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发现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的农户林地转出量高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户主年龄及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分别对转入和转出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sup>[4]</sup>。冉陆荣构建流转行为为计量模型证实了初始承包地面积、流转难易程度对转入和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sup>[5]</sup>。刘延安利用面板数据对流转行为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林地面积、家庭收入状况以及采伐制度、森林保险等政策因素对于农户流转行为具有决定作用<sup>[6]</sup>。谢屹以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构建农户流转意愿分析模型,证实收益及风险预期、流转价格和劳动力数量等是影响转入、租入、转出和租出等的重要因素<sup>[7]</sup>。

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济及社会资本特征、林地自然条件、林业经营状况、林权及采伐制度安排和流转市场条件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为促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集体林经营制度安排下,包括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林地自然资本在内的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和行为决策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不同文献研究结论的证实。但总体来讲,缺乏以家庭禀赋为概念的因素识别、归纳和统一的实

证分析。因此,笔者拟借鉴已有研究,在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决策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家庭禀赋对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并结合调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期为促进林地流转提供参考。

##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1. 农户林地流转理论分析

林地流转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基础上林业产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次诱致性制度变迁,明晰的产权归属是农户发生林地流转的基础。农户行为的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即理论上农户是否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动机。西奥多·舒尔茨论证了传统社会的农民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一样,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sup>[8]</sup>。史清华则提出农户的经济行为通常是理性的,但在市场建设不规范时也可能会出现“反常”行为<sup>[9]</sup>。由于林地资源具有不同于耕地资源的特殊自然和经济属性,在农户没有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前提下,林木也能实现自然生长,林地也能实现增值。加上农村市场建设不规范,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在实践中,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往往被误认为是非理性的。

笔者认为由于林业经营周期较长,经营收益的获取是一项预期性的未来收益,而流转收益则为眼前的一次性收益。农户林地流转决策的依据即为眼前流转收益与未来经营收益的比较,当流转收益高于预期经营收益时,农户则倾向于林地转出。林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营效益,农户进行林地流转行为决策必然出于其经营规模的考虑,扩大经营规模若有利于获取更高报酬,林农将选择林地转入<sup>[10]</sup>。而在技术水平和林地经营规模一定的前提下,家庭经营过程中劳动力投入增加所获得的林地边际收益将会出现先递增后递减。假定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所获取的边际收益不变,即劳动力从事林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那么,劳动力投入林业生产的经营收益与其机会成本的比较成为农户进行扩大或缩小林业生产投入的依据。林地流转交易实质是流转主体双方林业就业机会与非农就业机会之间的转化,因此,非农就业机会及其收益与林地经营收益的比较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样重要。

### 2. 研究假设与模型选择

根据农户林地流转决策的理性分析,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安排下,农户流转意愿及行为可能

受到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借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关于家庭禀赋表征维度和变量的研究经验<sup>[11]</sup>，笔者从农户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林地自然资本等方面选取变量。

(1) 人力资本。家庭人力资本是农户家庭禀赋的基本要素。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其家庭收入来源也可能越多，对于林业经营的依赖程度就越低，但也可能有更多剩余劳动力从事林业生产经营<sup>[12]</sup>。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则其越倾向于从事边际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获取更高的平均边际收益，从而越有可能放弃林业经营；但拥有较高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家庭对于林地流转政策的认识也可能更全面和到位，易于识别政策红利，并且具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因而更倾向于转入林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当然，家庭教育人口负担数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经济压力和对林业资源变现的需求程度，即家庭上学人口数越多，农户越有可能流转出林地获取一次性收益，并且从事其他非农劳动获取更高收益。最终，非农劳动收益与林业经营收益的比较必然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如若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较多，具有向城镇迁移明显倾向，则农户更倾向于流转出林地；虽然农村可能会有留守老年人，但其劳动能力较为有限，转入林地扩大林业生产的可能性也极小。

(2) 经济资本。一般而言，拥有较为丰富经济资本的农户家庭对林业经营的依赖程度较低，从事非农经营或劳作所获取的收益要高于林业经营，因而这样的农户倾向于流转出林地，获取更高的经济投资回报。但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非农经营渠道不断增加，导致林业经营更多地以副业形式而存在，林业又具有不需要劳动力、资本投入也能实现自然生长和增值的特点，因此，拥有丰富家庭经济资本的农户对于资金变现的需求程度较小，可能更不愿意将林地流转出去。总的来说，家庭经济资本既有可能促使农户林地流转，也可能抑制林地流转。

(3) 林地自然资本。林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营效益，农户一般会依据所拥有的家庭林地资源进行理性判断。若是自家拥有的林地资源较少，难以实现一定的规模效益，那么保留林地进行林业生产经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倾向于流转出林地。林地资源的细碎化程度同样是规模效益获取的关键，细

碎化程度较高，林农将放弃分散部分的林地经营。而林木种植的位置和山林地势也是影响农户是否发生林地流转的关键。林地位置如若较为偏远，日常经营或采伐较为困难，农户保留林地经营权的可能性就较低。概括而言，即拥有林地资源越少、越细碎化、质量越差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林地。

(4) 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农村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农户家庭所享有的社会资本是其获取制度外收益的关键。如若家中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可提高其获取林业采伐指标的能力，或提高其林地流转交易信息的获取能力，从而促进林地流转。林业经营新技术获取难易程度是表征其家庭社会资本的另一指标，倘若农户林业技术获取较为容易，则会降低林业经营的成本，从而提高经营效益，鼓励加大经营规模，促使实现林地流入。

笔者以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流转意愿及行为分别包括流入与流出两方面。根据研究假设，选取家庭年收入、劳动力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上学人口数、外出务工人员数、林地总面积、林地质量、林地总地块、林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以及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流转意愿及行为均为二分类变量，故选取 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具体模型为：

$$\text{logit}(P_i) = \ln\left(\frac{P_i}{1-P_i}\right) \quad (i=1,2)$$

$$E(y) = \text{logit}(P_i) = \beta_0 + \beta_1 X_{it} + \beta_2 X_{it} + \dots + \beta_j X_{it} + \varepsilon_{it} \\ (i=1,2,\dots,n; t=1,2,\dots,m)$$

其中， $\beta_0$  是截距向量，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j$  分别为各变量的估计参数。 $X_1, X_2, \dots, X_i$  表示影响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各个解释变量。模型测算过程中，假设农户流入林地的意愿及行为概率为  $P_i(Y_i=1)$ ，则农户不流入林地的概率为  $(1-P_i)(Y_i=0)$ 。

### 三、数据来源与计量结果分析

闽西北山区作为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综合试点地区，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基础上，林地流转渐趋于活跃。2013年7月笔者所在课题组以三明市梅列区、尤溪县以及南平市顺昌县为主要调研区域，选取13个镇、2个街道的52个村开展入户调查，共完成问卷数量183份，剔除数据不完整以及前后数据存在严重误差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179份。调研内容包括农户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禀赋、

林业经营及流转情况等。基于调研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其中，林地质量根据林地肥沃程度、林地坡度是否超过 30 度以及林地交通便利程度进行综合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划分为 1~5 个质量等级。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则根据农户自身的认识划分为 3 个层次。

根据数据统计，样本农户中 97 户(占 54.2%)愿意流入林地，但实际流入林地的农户有 54 户(占 30.2%)；愿意林地流出的农户共有 37 户，但实际有林地转出的仅 8 户。此外，已有林地流入的农户中

仅有 3 户表示不愿意继续流入，这表明林地流入的经济效益可观，农户大都愿意继续流入。调查中还发现，少量农户既有林地流出意愿也有流入意愿，这说明农户有进行林地资源整合的愿望。林地流转的面积分布各异，最小流转面积为 0.2 公顷，最大面积为 33 公顷；流转林地的总地块为 103 块，其中流入为 92 块。57.9%的农户直接流入林地，42.1%的农户流入林木，且毛竹为主要林种，流转去向则以本小组和同村其他小组以及村集体为主。

表 1 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Y_1$ 是否发生转入行为(否=0；是=1)	0	1	0.318	0.467
$Y_2$ 是否愿意转入林地(否=0；是=1)	0	1	0.542	0.500
$Y_3$ 是否愿意转出林地(否=0；是=1)	0	1	0.207	0.406
$X_1$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8	12.6	6.840	2.678
$X_2$ 外出务工成员数(人)	0	4	0.609	0.932
$X_3$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0	6	3.260	1.115
$X_4$ 上学人口数(人)	0	3	0.665	0.800
$X_5$ 家庭年收入(元)	3 000	5 00 000	65 895	61147
$X_6$ 林地总面积(公顷)	0.03	41.2	5.2	7.7
$X_7$ 林地总地块(块)	1	12	3.603	2.168
$X_8$ 林地质量(1=非常好；2=较好；3=一般；4=较差；5=很差)	1	5	2.815	1.286
$X_9$ 林业技术获取难度(1=容易；2=一般；3=不容易)	1	3	2.307	0.591
$X_{10}$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否=0；是=1)	0	1	0.436	0.497

笔者利用 Eviews 统计软件测算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和意愿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样本量的限制，实际发生林地转出的农户样本相对较少，笔者未对其进行模型测算分析。计量结果表明，样本农户转入行为、转入意愿以及转出意愿三个测算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0.370 9、0.570 9、

0.495 1，表明家庭禀赋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林地流转行为和意愿进行解释。家庭禀赋各变量确实对样本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和流转意愿产生了影响，不同的家庭禀赋变量在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和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影响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家庭禀赋变量对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检验结果

维度	变量	流转行为		流转意愿	
		是否转入	是否愿意转入	是否愿意转出	
家庭人力资本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ln(X_1)$	0.464 4*** (0.176 8)	0.111 6*** (0.010 9)	0.051 9*** (0.010 1)	
	外出务工成员数 $X_2$	-0.026 3 (0.326)	-0.058 4 (0.045 8)	0.065 7* (0.037 1)	
	家庭劳动力数量 $X_3$	-0.070 7** (0.027 8)	-0.017 3 (0.035 9)	0.011 2 (0.031 1)	
	上学人口数 $X_4$	-0.003 6 (0.037 5)	0.087 6 (0.044 7)	0.032 6* (0.022 3)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 $X_5$	0.000 01*** (0.000 004)	0.000 001** (0.000 006)	0.000 004 (0.000 006)	
家庭自然资本	林地总面积 $\ln(X_6)$	0.385 4*** (0.054 6)	0.174 1** (0.088 7)	0.001 3** (0.000 6)	
	林地总地块 $\ln(X_7)$	0.042 1 (0.115 2)	0.441 2** (0.170 3)	0.065 2** (0.020 0)	
	林地质量 $X_8$	-0.009 3 (0.023 0)	0.010 5 (0.029 6)	-0.028 1 (0.025 8)	
家庭社会资本	林业技术获取难度 $X_9$	-0.020 1* (0.010 9)	-0.066 3*** (0.019 1)	-0.042 3** (0.017 7)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 $X_{10}$	-0.114 0* (0.058 9)	0.012 3 (0.078 9)	-0.142 5** (0.068 9)	

注：\*表示 10%的显著水平,\*\*表示在 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 1%的显著水平；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差。

(1) 家庭人力资本禀赋对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 0.01 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林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及转入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与前述分析较一致。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家庭对于林业改革政策有较为准确的解读,并能较快地对政策变动做出反应,通过更好地配置资源,还能够从加强林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取规模经营效益。因此,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发生林地转入行为或拥有较强的林地转入意愿。而与此同时,由文化知识水平积累带来的就业选择机会较多,农户在遵循成本-收益分析原则进行理性行为选择时,更倾向于从事边际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获取更高的平均边际收益。

样本农户中家庭外出务工成员数在 0.1 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前述分析一致。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林业的经营多数沦为兼业化经营,受人力资源限制,在林业长周期的自我增值和林地流转的一次性收益比较之下,农户往往具有较强烈的林地转出意愿。而家庭外出务工成员数对林地转入行为以及林地转入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转出的样本农户中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也较少。

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对流转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拥有较多劳动力数量的农户家庭由于享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渠道,对林业经营的依赖性较小,因此发生林地转入行为的概率相对较低。进一步地,发生林地转出行为的样本农户拥有家庭劳动力数量集中在 3~4 人,即发生林地转出行为的农户多集中于拥有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的样本农户中。家庭劳动力数量对林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上学人口数在样本农户回归分析中仅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这说明家庭教育人口负担提高了农户对林业资源变现的需求,并形成了较大的家庭生活经济压力,由于从事林业经营的较高机会成本,农户具有较强的林地转出意愿。

(2) 家庭经济资本禀赋对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家庭年收入分别在 0.01 和 0.05 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林地转入意愿和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具有较强的林地转入意愿。这说明基于对林业资源变现相对较低的需求度,并结合林业自我增值的特征,在相对简单、单一的农村投资市场,林业经营可能成

为农户少量闲置资金投资的去向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经济收入水平的分化一定程度上表明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因此,家庭经济资本禀赋积累越多将越有利于促进林地流转。而家庭年收入对农户的林地转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即家庭总收入并非农户在进行林地转出行为决策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3) 家庭自然资本禀赋对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农户家庭所拥有的林地总面积在 0.01 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0.05 显著水平上对林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调查结果显示,发生林地转出行为的农户家庭所拥有的林地面积一般较小。这表明林地资源自有量较少的农户相对较难获取规模经营效益,偏向于发生林地转出行为;反之,拥有较多林地农户则有进行林地转入,以相对较低林地投入成本获取林业规模化经营效益的动力。农户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相悖于前述分析。这可能是由于沿海地区农业产业的相对弱质性更为凸显,导致农户对于林业产业发展的较悲观心理预期;另一方面,福建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半城市人口普遍存在,而这类人往往较少从事农业经营。此外,农户普遍认为限额采伐制度存在强约束性,对于林业流转存在后顾之忧。因此,存在拥有较多林地资源的农户同样具有强烈林地转出意愿的现象。

林地总地块在 0.05 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林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由于农村住户布局较为分散,而林地经营的分散性对其经营规模的获取阻碍作用更为明显,回归结果表明农户都有进行林地整合的意愿。

林地质量因素对于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样本调研区域相对集中,具有比较一致的林地地理位置,从表 1 可知,林地质量的评价均值处于居中水平,且总体评价价值的离散程度较低,因此,不同林地间的较小质量差异水平未对农户的行为选择和决策造成显著影响。

(4) 家庭社会资本禀赋对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林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分别在 0.1、0.05 以及 0.01 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转入及转出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技术是农户进行林地流转的重要考虑因素。技术获取渠道通畅能够降低林业经营成本,形成农户发生林地转入行为扩大林业经营规模的经济激励。从林业技术因素对转

入行为和转入意愿的影响系数比较可知,其对转入意愿的影响更为强烈,这表明林业经营技术对农户而言日益重要。另一方面,林业技术获取越容易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户家庭享有的社会资本较丰富,容易导致农户从林业经营中游离出来从事其他非林产业经营,因此农户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林地转出意愿。因而,提高技术可得性将促使农户发生林地流转。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变量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和农户转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家中有村干部或林业站的农户并没有发生转入行为,更多地是发生转出行为。一般而言,农户家庭所享有的社会资本是其快速获取林业制度改革政策红利的关键。而家中村干部及林业站工作人员变量对转入意愿影响作用的弱化及其对转出意愿的负向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林地流转的作用在日益弱化,流转更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

#### 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上述研究表明,农户具有较为强烈的林地流转意愿而实际发生林地流转行为的农户数量相对较少。农户发生林地流转行为的约束因素可以一定程度上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视角得到解释。不同方面的家庭资源禀赋对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各异。其中,家庭经济资本仅对转入行为、转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他维度各有一个变量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平均受教育年限、林地总面积、林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正向、负向影响。外出务工成员数和上学人口数对转出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林地总地块对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中是否有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转入行为和转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上述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一是较于当前林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实际情况,农户进行林地流转的意愿仍然较为强烈,而家庭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较高、林地资源较丰富的农户中存在转出、转入意愿及行为的两种分化,政府应在稳定分林到户的家庭承包制度基础上,完善流转政策和交易市场,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方面促使农户间的林地自由流转。二是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是实现林业

资源高效整合的基础。通过发挥林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大力发展联户、股份等多种创新经营形式,引导愿意扩大林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sup>[12]</sup>,充分利用林业生产要素。三是鉴于农户林业兼业化经营、家庭人力资本外流对林业经营依赖程度弱化,且不同类型农户主体在转入和转出意愿存在不同的需求,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应大力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半城市化人口真正从农地、林地资源中游离出去,加快林地流转。四是结合家庭社会资本和林地资源禀赋对农户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结果,完善限额采伐制度和加强林业技术支持将是两大工作重点。采伐指标的获取和规范分配将有助于推动农户流转收益的实现,解除流转的后顾之忧。而林业技术显然能够降低林业经营成本,促使林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

#### 参考文献:

- [1] 聂影. 林权流转的多维动因分析与激励路径选择[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5-9.
- [2] 蔡志坚, 李莹, 谢煜, 等. 基于 TPB 模型的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分析框架[J]. 林业经济, 2012(9): 8-12.
- [3] 徐秀英, 石道金, 杨松坤, 等. 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 林业科学, 2010(9): 149-157.
- [4] 孔凡斌, 廖文梅. 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8): 89-97.
- [5] 冉陆荣, 吕杰.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林地流转行为选择[J]. 林业经济, 2011(2): 121-126.
- [6] 刘延安, 刘芳, 何忠伟. 集体林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定量研究[J]. 林业经济, 2013(9): 7-14, 59.
- [7] 谢屹, 李小勇, 温亚利. 农户集体林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1): 13-19.
- [8] 西奥多·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9] 史清华. 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9.
- [10] 谢屹, 温亚利. 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4): 48-54.
- [11] 张文婷, 吕杰, 宁金萍. 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农户林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23-27.
- [12]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 2012(3): 157-181.
- [13] 申津羽, 侯一蕾, 吴静, 等. 农户选择林业不同经营形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林业科学, 2014, 50(11): 139-146.

责任编辑: 李东辉